

新传媒

NEWMEDIA

2012.4

主 办 中国传媒大学
媒体创意研究中心

协 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主 编 宫 承 波

*New
Media*



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与互动：农民工与传媒研究的另一种路径

公民新闻的传播学反思

我国OTT TV的定位与转向

新世纪中国动画的民族化发展道路探究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学界立场

业界眼光

生态传播

创新传媒

新传媒

2012.4

NEWMEDIA

主办 中国传媒大学
媒体创意研究中心
协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编辑 宫承波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传媒. 2012 年第 4 期/宫承波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043-6787-7

I. ①新… II. ①宫… III. ①传播媒介—文集 IV. ①G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4538 号

新传媒 2012.4

宫承波 主编

责任编辑 王 佳

封面设计 亚里斯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ntp.com.cn

电子信箱 cnt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787-7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新传媒 2012.4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创意研究中心 主办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协办

主 编 宫承波

副主编 王建华

编 委 (按姓氏音序排列)

崔蕴芳	成文胜	方毅华	贺 明	金梦玉	蒋海升
黎 斌	李飞雪	李晓霖	刘年辉	凌昊莹	罗 琳
倪 桓	宋培义	沈楚瑾	唐远清	涂晓华	王 军
闫玉刚	杨 凡	余小梅	赵光怀	赵云泽	詹 骞
詹新惠	张 丽	张腾之	张晓红	张晓辉	庄 捷

本期特约编辑

田 园 翁立伟 范松楠 管 璘 吴 迪

主编絮语

宫承波

主编简介

宫承波（1966—），山东章丘市人。山东大学文学（文艺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民族社会学）博士后。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媒体创意专业委员会主任、媒体创意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主要致力于传媒理论、媒体创意及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第49期《南都周刊》火了！

翻阅其中的《起底王立军》组稿，对于其中爆料的官场秘闻，本人并无多少兴趣；引起我关注的是，王立军居然先后被国内外29所大学及研究机构聘为教授、研究员或主席、主任等，甚至还有几家国内的大大学聘他当了硕导、博导，让他堂而皇之地带上了博士生、硕士生！

我先是瞪大了眼睛，然后却又不自主地闭上了眼睛……

应当承认，最初的几年里，王从一个初中生起家，经过几年的苦读、努力，很快获得了中专、大专文凭，还是很令人高看的，表明他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年轻人，同时也可以证明他是很聪明也颇有点才干的。但后来的十几年间，他居然在投身警务工作的同时，一跃成为多少专职教研人员奋斗一生而不得的教授、博导，而且还横跨了几个学科，甚至跨越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离奇了，不能不使人在深表钦佩的同时也难免要生些疑窦了——他是神仙，还是巨人？尤令人不解的是，如此“离奇”之人，那些智商、情商都要明显高于常人，而且作为学者必备怀疑素质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们难道就没有生过疑虑、打过问号？

事实证明，他们不过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原因在于，他们都过于入世、过于“聪明”了——在资源、功利面前，他们折腰了、迷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清高、斯文，现代大学应有的求实求是之精神、超脱独立之精神，他们都全然不顾了，不要了！正是这些“聪明”的人们从而成就了王立军，成就了“王立军定律”——其实质即是官学联姻、权学交易！在当今的中国，以公权换取私利早已比比皆是，但令人悲哀的是，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到，如此之多的学人、高校也愿意积极主动地送上门去逢迎权势、屈膝拜官，一些大学的校长、书记甚至名牌大学的校长、书记也未能幸免，说明此阴风渗入学界久矣，深矣……

记得几年前曾看到一篇文章，谈到前美国国务卿赖斯曾有卸任后到哈佛大学任教的想法，但信息传开去，哈佛大学却没有接她的绣球。以此比称，我们中国的某些大学可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呀！以权谋私、借势装裱自己，作为官场混混的王立军自然是不光彩的，但拙见以为，更不光彩，甚至可以说是蒙羞的是不是当属我们的教授、我们的校长和我们的大学呀……

目录

CONTENTS

主编絮语

宫承波

特稿 Special Reports

- 2 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与互动：农民工与传媒研究的
另一种路径 涂凌波

焦点话题：公民新闻 Focus

- 12 公民新闻的传播学反思 刘宗义
- 17 论公民新闻对传播者与受众的影响 姜笑君
- 22 公民新闻在微博传播中的自我修正机制探析
——以微博假新闻为例 李文贤
- 28 微博对公民新闻的推进与制约作用探讨 王欢

新媒体前沿 New Media Frontier

- 36 我国 OTT TV 的定位与转向
——基于 OTT TV 概念、特性和国内外发展现状的考察
..... 金梦玉 西晨

44	浅析微博传播的社会效果	
	——以 2011 年微博大事件为例	成文胜 王舒夏
51	微博营销效果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以新浪微博凡客诚品粉丝平台 (@VANCL 粉丝团) 为例	
		万 幸
57	都市报微博的内容建设探析	王维砚 肖 旻
65	媒介生态视野下微电台的生存空间探析	沈宇辰

广播电视前沿 **Radio and Television Frontier**

76	广播媒体的听觉传播价值试析	田 园
84	媒介融合环境下广播与新媒体融合的必然性与可行性试析 ...	王 欢
89	CNN 的成功之道试析	薄 璐
104	试析凤凰卫视资讯台的现状及发展	王 杰
116	我国早间电视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	哈艳秋 曹 会
123	巧妙设置悬念 运用延宕手法	
	——浅析央视《看见》节目的叙事技巧	闫 珊 宋若微

新闻与传播研究 **News and Media Research**

130	环境传播对构建公共领域的意义初探	范松楠
135	韦斯特利的传播模式试析	管 璘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Research**

- 144 新世纪中国动画的民族化发展道路探究 朱逸伦 宫承波
- 170 日记体小说与其改编电影的叙事学比较研究
——以小说《失恋 33 天》及其同名改编电影为例 刘辛未

会议综述 **Conference Overview**

- 178 都市报的危机与生机
——都市报生存发展研讨会综述 郝一民 吴 静

读书乐园 **Book Club**

- 190 春晚的多维解读与理性审视
——读《春晚三十年》 闫玉刚 郑 玥
- 193 一种“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情结
——《春晚三十年》读后 杨夏月 冯仲平
- 196 集体智慧的闪光
——简评《春晚三十年》 梁 婷



Special Reports

特稿

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与互动：农民工与传媒研究的另一种路径

【摘要】本文详细梳理了农民工与传媒研究的两种传统路径——媒介内容研究和受众研究。认为农民工“边缘人”形象是被建构的，而媒介话语及其变迁的考察视野太狭窄；大众传播中的农民工不仅是“弱势阶层”，更是被忽视的受众主体，研究中的媒介中心主义值得警惕。本文认为，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等质化研究方法，关注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传媒影响和互动，有助于理解媒介与农民工关系的动态性和结构性，是一种在宏观和微观上均有价值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农民工 传媒 媒介内容 受众研究 日常生活

■ 涂凌波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与传媒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路径展开：一是从媒介内容出发，研究农民工报道，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呈现以及农民工的话语权；二是从受众研究出发，研究农民工的媒介接触，信息的使用与满足以及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对农民工的影响效果；三是从传媒视角考察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人际传播、文化消费、城市融入等问题。前两个方面的研究较多，第三个方面的研究较少。总的来看，农民工与传媒的研究越来越被重视，成果不少，研究视角也愈加多样。然而，一些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比如我们为何要关注农民工与传媒的问题，它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在中国社会转型、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传媒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被夸大了还是被忽视了？新媒体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群体？等等。

相比已有的诸多研究，这些问题更为宏观。事实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将直接影响农民工与传媒研究的取向。本文尝试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考察来分析这些问题，重点在于探讨不同研究路径下各自的差别和局限。

一、被建构的“边缘人”形象

在社会学研究中，农民工被普遍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户籍制度上看他们拥有农村户口，但大部分的农民工却在城市里从事着非农业的生产，这个群体在城市和农村往返“迁徙”，他们虽然被看做是农民，但又与传统的农民有所区别，工作在城市，却又被看做是城市的“边缘人”。在中国

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很难准确界定。在陆学艺的十大阶层划分中,农民工属于逐渐脱离“农业劳动者阶层”,主要集中于“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中的群体。“现有的制度设置和社会结构格局迫使农民无法直接变成工人,而只能进入农民工这种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①

自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波“民工潮”以来,农民工这个“户籍身份是农民,但主要从事着非农业生产”^②的群体,大概以年均1000万人的规模从农村流入城市。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亿,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③农民工的数量经过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激增后趋于平缓,保持着一定的规模。这一庞大的群体正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爆发点。

“农民工”的形象是被建构起来,并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深入人心的。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流民”问题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影响着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动,因此在人口迁徙和流动被禁锢了三十多年后,市民和媒体最初把农民工当做“盲流”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业化进程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移民问题,由于生产方式变更而造成的就业、教育、医疗、犯罪、社会融入等问题,往往会加剧移民群体和市民群体的紧张关系,影响着社会对移民群体的形象认知和态度。再者,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极大限

制了农民工阶层的流动和城市融入,有学者称之为“社会流动情距”^④,即“农民工职业流动与社会身份转变的不一致性、不协调性”。制度性缺失不仅阻碍着农民工身份变化的重新确认,也影响着媒体对农民工的话语再现。以上这三方面,被经常用来作为解释、分析农民工媒介形象建构的社会因素。

根据经典的话语分析方法,加之媒介形象研究中对内容分析的“迷恋”,大多数的研究者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不同媒体、不同时间段的农民工报道。比如,有学者运用文化研究中的“再现”概念,随机抽取广州市四家日报在2000年到2002年三年间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农民工的形象被“高度类型化”,集中表现为“受难形象”和“负面行为者形象”,这是由于报纸采用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受难叙事”和受难形象有助于农民工群体自身主体经验的表达,并促进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理解和认同;负面行为叙事和“负面形象”则倾向于将农民工再现为城市社会的“威胁”和“麻烦”,抑制了农民工群体的主体经验表达,并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社会获得文化承认。^⑤

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倾向于制造农民工的“负面形象”,这也被普遍认为是媒体的“妖魔化”、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行为。一项对三份报纸的内容分析发现,“负面形象”报道所占的比例高达61.1%,媒体对农民工的“妖魔化”定型主要为:违法犯罪者、愚昧无知者、肮脏病态者、背

①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319页。

② 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 数据来源:《共产党员》2011年第14期;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2010年6月。

④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336页。

⑤ 李艳红:《一个“差异人群”的群体素描与社会身份建构:当代城市报纸对“农民工”新闻报道的叙事分析》,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信欺诈者、野蛮粗俗者、蛮横凶残者、城市秩序的破坏者、贪婪自私者。^① 由于该内容分析的时间段仅为一年,“妖魔化”的结论恐怕有点夸大其辞,但农民工媒介形象的负面化的确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多是在讨薪、维权、行为失范、被救助等状况下,或者事态发展到相当严重时才被媒体报道的,偏见、歧视和冷漠等媒体失范行为更多地出现。^② 媒介上农民工“负面形象”的长期呈现,将“对农民工形象的贬低性认知构成了城市主体的社会记忆,这些记忆通过媒介、图像、话语或各种集体活动得到了延续、重温或强化,催化了城市主体歧视的集体意识和歧视惯习的形成,产生了歧视集中效应”^③。

可以说,对农民工的歧视、社会身份的认同和城市融入等问题与媒介呈现息息相关。李普曼(Walter Lippman)的“拟态环境”论、培养分析理论、议程设置理论、集体记忆理论、刻板印象理论等说明,媒介形象呈现影响公众的认知。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媒介社会逐渐形成、媒介社会化和媒体媒介化的今天,这种影响尤其不能忽视。当然,也有人认为对农民工的传媒形象提出质疑,认为“也许是从政府、农民工立场建构了农民工沐恩者、改造后的成功者形象;也许是站在市民立场,对农民工进行了扭曲再现,农民工成了出尽洋相的小丑、地位低下的倒霉蛋、为非作歹的恶棍;也许农民工群体在大众传媒中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④。

事实上,这种不确定性或不固定性,是因为农

民工媒介形象、媒介话语也随着农民工问题的变化、媒介的发展而有所变迁。一项对1980—2009年间《人民日报》的农民工报道研究发现,主要有三方面变化:一是农民工本身话语的变化,即由抽象的“经济因子”到全面的“人”;二是农民工与城市关系话语的变化,从“清退对象”到“新市民”;三是农民工与管制力量关系话语的变化,从“清退”到“庇护”。^⑤ 另外一项研究也发现,“对话料进行的历时分析结果表明了新闻工作者、政府部门和社会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从负面态度向积极态度的转变”^⑥。在对《南方周末》1984—2010年间关于农民工报道的分析发现,即使在最热衷于关注弱势群体的媒体身上,这种变化也显而易见,大致以1994年为时间点,报道数量呈明显增加,报道角度从“盲流”到急剧的“惊觉”,逐步聚焦于弱势群体的关怀上。^⑦

从农民工报道的历程来看,尽管媒介话语不断变化,但农民工的“边缘人”形象却越来越凸显。另外一项关于《人民日报》在1987年到2007年的农民工报道研究则发现,农民工被构建和再现为无名的、无声的、边缘化的、无根的、飘忽不定的、需要帮助、关爱和保护的弱势群体。^⑧ 讨薪维权行为是近年来媒介报道农民工的焦点之一,有学者研究了这方面的报道,认为“作为都市里的边缘群体,他们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隔阂也是不争事实,媒介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报道正是这

① 黄安达:《“妖魔化”:农民工群体之媒介定性——国内报纸有关农民工报道的考察》,吉林大学2007届硕士学位论文。

② 许向东:《试论农民工报道中传播者的偏见与歧视现象》,载于《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2期。

③ 王星:《城市农民工形象建构与歧视集中效应》,载于《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11期。

④ 刘根勤、陈晓颖:《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形象建构》,载于《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

⑤ 罗真:《农民工媒体话语的历史变迁——以1980—2009年〈人民日报〉的农民工报道为例》,复旦大学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

⑥ 唐斌:《〈人民日报〉中(1987—2007)农民工的话语再现》,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

⑦ 张玉凤:《〈南方周末〉农民工报道的框架分析及其议题变迁》,兰州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

⑧ 唐斌:《〈人民日报〉中(1987—2007)农民工的话语再现》,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届博士学位论文。

种隔阂所制造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表征”^①。有研究发现,新闻场中农民工报道的议题集中于“农民工—政府”、“农民工—雇主”、“农民工—城市(市民)”三种矛盾,而媒体再现时往往将农民工的社会处境简化为经济处境,塑造为“经济利益被侵害”的“弱势群体”,从而忽略了其他政治、社会生活等矛盾和诉求。^②

正如上文所提及,历史因素、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等社会因素是传媒建构“边缘人”形象的社会基础,大众传媒通过媒介“再现”、框架设置和叙事策略,强化了“边缘人”形象的建构,“农民工不断被城市建构为‘他者’的景观,是城市景观当中的异己性存在”^③。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分析的媒体大致分为党报和市场化报纸两类,杂志、广播和电视的研究则较少。其中,或许由于政治影响力和资料的可获得性,《人民日报》是最常见的研究样本。正如有研究者在关注媒体话语与权力关系时提到,“农民工媒体话语的生产过程也是由社会的强势群体主导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以及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文化精英群体共同确定着有关农民工话语的基调”^④。也有人比较了金融危机时期大陆、香港和台湾媒体的农民工报道后发现:《人民日报》以正面为主,倾向于“政府政策与管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议题;《东方日报》负面居多,集中在“农民工犯罪”议题;《中国时报》多为中立,为“政府政策与管理”议题。^⑤的确,媒介属性、权力关系和政府决策影响着媒体对农民工形象的塑造,但仅将研究集中于《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显然

不够全面。农民工媒介形象,应该是不同类型媒体共同“再现”和构建的结果,因此对农民工形象及其成因的研究需要更为开阔的视野,广播、电视等其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应该成为考察的对象。

此外,一些研究也将农民工的“边缘人”形象归因于传媒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以及从业者缺乏职业道德等因素。在某些特定的农民工报道中观察,这种归因是合理的,比如前几年媒体大肆渲染的“农民工讨薪跳楼秀”等报道,但在群体整体形象构建方面,则还需比较不同阶层形象的构建差异,来验证这种因素是否只存在于农民工报道上。

二、被忽视的受众主体

如果说农民工的“边缘人”形象是大众传媒建构的结果,那么农民工在传播中的边缘地位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农民工很难被称为受众主体,因为农民工的媒介接触、媒介使用与消费、媒介需求等程度普遍较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形成、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普及等因素,农民工的信息传受行为也正发生变化。针对农民工的受众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将农民工作为受众,考察其收受状况、收受行为;二是研究农民工对特定媒介(主要是手机、PC互联网)的接触和使用行为。

将已有的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并比较,见表1:

- ① 陈红梅:《大众媒体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以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道为例》,载于《新闻大学》2004年第1期。
- ② 乔同舟、李红涛:《农民工社会处境的再现:一个弱势群体的媒体投影》,载于《新闻大学》2005年第4期。
- ③ 张慧瑜:《农民工:暧昧的命名与尴尬的主体位置》,载于《南方论丛》2008年第3期。
- ④ 罗真:《农民工媒体话语的历史变迁——以1980-2009年〈人民日报〉的农民工报道为例》,复旦大学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
- ⑤ 黄榕、储可君:《金融危机期间的农民工媒介形象——大陆、港、台三地报纸的比较分析》,载于《东南传播》2010年第9期。

表1 历次农民工受众调查比较表^①

年份	调查名称	有效样本数(份)	媒介接触类型、频率(%)			媒介接触内容(%)			媒介接触时段(%)	接触地点(%)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一	第二	第三	主要	主要
2003	陶建杰:上海徐汇区调查	368	电视 59.9	报纸 29.3	广播 19.3	电视剧 68	新闻 61.1	电影 41.3	晚上	家里
2005	农民工文化生活质量调查	6268	电视 34.7	书籍报刊 15.1	广播 11.7	新闻 49.9	娱乐 47.8	法律 21.8	无	无
2008	张雅利:兰州地区调查	207	电视 56.0	报纸 48.8	不清楚	社会新闻	娱乐	不清楚	晚上 68.6	家里 70.5
2008	陈静:长沙市调查	456	电视 73.3	互联网 48.0	报纸 32.2	电视剧 62.0	新闻 60.0	娱乐 54.0	晚上 65	家里 66
2009	刘必昊:北京市调查	500	电视 57.0	手机 27.0	报纸 6.0	娱乐体育类 82.0	新闻 65.0	天气生活 11.0	无	工作地点 38
2010	包凌雁、徐静:宁波市调查	449	手机 58.8	电视	网络	新闻 40.39	电视剧 40.0	综艺节目 17.48	无	家里
2010	郑素侠:郑州市调查	974	电视 38.9	手机 30.1	网络 11.7	家乡的消息	政府政策	国内外大事	无	无
2011	董迅石:南京市调查	197	电视 20.0	手机 18.0	报纸 17.0	新闻 30.0	天气预报等公共信息 22.0	娱乐 20.0	无	无
2011	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869	手机 96	网络 75.4	电视 73.1	网络(上QQ, 98.8)	网络(视频、音乐、娱乐, 96.5)	网络(浏览家乡新闻, 91.5)	网络(晚上, 46%)	网络(网吧, 61.7)
						手机(通讯, 99.2)	手机(娱乐, 90.8)	手机(实用工具, 90.1)	无	无

说明:为了便于比较,表中“媒介接触内容”、“接触地点”和“接触时段”三项,若原调查中无均值数据,则采用接触频率最高媒介的数据进行统计。

① 本表统计了几次农民工受众调查,参见陶建杰:《民工的媒介接触状况及评价——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载于《新闻大学》2003年第4期;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质量调查课题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质量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9页;张雅利:《农民工媒介接触状况及评议——以兰州地区为调查分析单位》,载于《东南传播》2008年第4期;陈静:《长沙市农民工媒介消费研究》,湖南大学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刘必昊:《在京农民工媒介消费行为模式的调查分析》,载于《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包凌雁、徐静:《宁波市农民工媒介使用调查及对策》,载于《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期;郑素侠:《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基于河南省郑州市的调查》,载于《现代传播》2010年第10期;董迅石:《南京市农民工媒介接触现状研究》,载于《新闻世界》2011年第9期;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载于《新闻大学》2011年第2期。

从2003年到2011年,笔者能查阅到的农民工受众调查超过20次,本文仅选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9次调查数据以作比较。为了观察近十年来农民工受众的整体概貌,将一些并不十分严谨的调查也纳入其中,但这并不影响基本的判断和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农民工接触媒介的主要类型经历了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变化,到2011年前后,手机、互联网已经成为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媒介类型。当然,电视作为受众最多的媒介,在农民工的媒介接触中一直保持在前三位,这与我国整体的媒介收受状况基本吻合。第二,由于每次调查对媒介内容的分类和界定差异较大,因此无法进行准确比较,但可以看出娱乐(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等)和新闻一直是农民工接触最多的内容。手机、互联网成为主要媒介类型后,娱乐和信息获取的渠道被分化,电视或许被主要当做娱乐渠道,而新闻获取、媒介互动、社会交往则通过手机、互联网渠道。第三,农民工媒介接触地点主要在家里(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除外),接触时段主要在晚上,基本未发生变化,这主要由农民工的工作性质和居住环境所决定。

如果仅从这些调查数据,很难得出农民工与市民的媒介收受行为差异,因为这些调查都没有对农民工与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媒介收受行为进行过比较,因此也缺乏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首先,绝大多数的社会学研究已经表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市民差异巨大,农民工尽管暂时脱离了传统的乡土社会,但并没有融入城市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延续聚族而居、同乡而居的生活模式,通过乡土社会中的“同质群体”来

寻求安全感,处于一种在身份、就业、社会交往等方面既有别于市民又不同于农民的“双重边缘人”^①地位。这种居住结构模式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媒介收受行为。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居住模式主要分为聚居模式和散居模式,散居农民工的媒介接触频率更高,对待媒介信息的态度更为开放,城市融入程度也高于聚居农民工。^②其次,对农民工媒介收受行为的调查基于传统受众研究的理论假设,即将农民工作为无差别的受众群体,认为通过问卷及量表就能够反映收受行为与认知。这种理论假设下的问卷设计和调查,要么夸大了农民工接触媒介的动机、需求以及媒介的影响,要么就简化了农民工所生活的复杂环境,使得调查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媒介中心”倾向,忽略了媒介在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角色。事实上,农民工的媒介收受行为与闲暇时间、文化水平、媒介需求、可支配性收入等众多因素相关。一项对珠三角某工厂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民工拥有较少的闲暇时间、相对边缘而狭小的闲暇生活空间,因此限制了他们闲暇生活的质量。^③对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相关研究,基本可以证实存在知沟假设(knowledge-gap hypothesis),因此一些学者也把农民工称作大众传播的“弱势阶层”,即“指那些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的人群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群体。”^④

那么农民工在大众传播中是否完全处于弱势

① 季孝龙:《“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的身份研究》,载于《西安外事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② 文一篇:《不同居住模式下农民工的信息接触与城市融入状况研究》,中南大学2011届硕士学位论文。

③ 《当前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边缘化生存: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来自珠三角某工厂的一项田野调查研究》,载于《宏观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④ 段京肃:《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地位呢?笔者认为应该分阶段来看待此问题。传统媒体时代,农民工的确是大众传播中的“弱势阶层”^①,这是由传统媒体的不易获得性、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媒介信息的单一性造成的,当然还与第一代农民工整体较低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工资水平、单一的信息需求(通信联络)和较低的城市融入等因素相关。新媒体时代,与其说农民工是大众传播中的“弱势阶层”,还不如说是“被忽视的受众主体”。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农民工发展史,也是农民工社会阶层缓慢变迁、年龄文化结构逐渐变化、与市民群体关系逐步改善的历史。这一历程与新媒体的兴起、信息传受方式的变化、中国媒体的改革等媒介发展史相结合,从而改变了农民工的媒介收受状况。较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手机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必需品,每个月手机花费50元以上的占63%,80.4%的受访者手机具备上网功能。^②由此可见,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自主、主动、有意识的受众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尽管这一变化过程还比较缓慢。紧接着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农民工作为同等重要却又有所差异的受众群体,在传播实践中改变以往狭隘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模式。

三、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影响与互动

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网络、

生活方式、文化消费、人际传播、社会行动、政治参与等研究逐渐增多。这些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跳出传统的传媒研究路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其中大部分的研究焦点已不再是农民工与传媒),像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赋权理论等更是被广泛使用;二是在方法论层面,开始采用民族志和田野调查法,关注农民工问题本身的动态性和结构性,并尝试将其还原到日常生活的实践中进行考察;三是尤其关注新媒体的普及和使用,一些研究更是将新媒体当做农民工身份认同、社会网络、人际传播等问题的主要变量。

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很早就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网络、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此三问题结合紧密,以往研究中大致从社会结构因素和主体行动因素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普遍认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出现危机,而结构性因素(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被视为最根本的因素^③;另一方面,从农民工主体行动来看,传统文化结构上的断裂以及由其带来的自我认同结构中的文化缺失,容易产生道德身份和自我认同危机^④。身份认同危机,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既得到强化,又得到某种程度的消解。农民工将乡土社会中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初级群体关系延续到城市^⑤,形成了一种与市民群体差异较大的社会网络结构,这种结构既固化了农民工边缘人的社会身份^⑥、阻碍其城市融入,

① 陈崇山:《谁为农民说话——农村受众地位分析》,载于《现代传播》2003年第3期。

② 李红艳:《手机:信息交流中社会关系的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手机行为研究》,载于《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农民工才是手机报的大客户群,手机报在农民工中有着较高的普及率和信任度,参见张蕾:《谁是手机报的大客户群——农民工群体手机报使用情况研究》,载于《中国出版》2010年第9期。

③ 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载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④ 潘泽泉:《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载于《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⑤ 朱力:《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于《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⑥ 潘泽泉认为农民工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特点,参见潘泽泉:《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载于《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又为其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资源,形成一种保护性机制。从人际传播研究来看,有学者发现农民工的人际传播网呈现“内聚性”、“差序格局”的特点^①,并认为人际传播形态对其城市融入有深刻影响,这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基本一致。然而,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人际传播也发生着变迁,有学者就认为,除了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外还有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后者对于进城农民工的人际传播起着重要的积极影响^②,甚至“随着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乡土关系’最终会逐渐消解并发展成为新的多元都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③。

不管是较悲观还是较乐观的观点,研究已开始强调动态分析的视角。质化研究不仅作为量化研究的补充,更是作为主要方法出现。正如前文所述,传统媒体对农民工日常生活的影响和农民工的收受使用情况测量,既容易陷入媒介中心主义,又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人际传播、身份认同等问题关联不大。“大众传媒(注:主要指传统媒体)对民工观念方面的影响力总体上微弱,但是在消费、维权等特定领域,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媒介对民工观念的影响效果,受民工自身自然时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制约。”^④

因此,新媒体、新生代农民工和质化研究,成为了这一领域新的研究旨趣。有研究者对深圳市

石厦村的湖南攸县籍出租车司机的媒介技术使用(包括车载电话、手机、互联网)进行了田野调查,观察新媒体技术对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发现“新媒介技术的推力或许远没有社会结构、社会身份、职业组织等制度性制约来得关键”,但研究者认为“流动人口日渐丰富的新媒介技术实践及其折射出来的多面向的人际互动过程”引人注目。^⑤ 该研究的缺陷在于研究对象的职业身份单一且较为特殊。而一项通过深度访谈、线上民族志开展的研究则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利用 QQ 建立社会网络,可以实现某种自我赋权(self-empower),为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和体制外的支持”^⑥。有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手机使用有四种模式,包括伪装存在、关注缺席、江湖关系、浪漫关系,这四种模式改变了农民工的日常生活。^⑦ 另一项通过民族志方法进行的研究同样通过赋权理论视角,证实了新媒体技术在农民工赋权——个体自主性获得过程中发挥的功能。^⑧

这样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在传统的媒介内容研究和受众研究之外,从社会性(社会网络、身份认同等)和符号意义层面开展的质化研究,是突破媒介功能取向的研究话语,跳出强/弱、大/小、多/少等二元思维的必然路径。

回到开篇提出的几个问题,从农民工与传媒

① 陶建杰:《农民工人际传播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5期。

② 徐丙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载于《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③ 陶建杰:《都市生活中的乡土关系——对进城农民工生活方式的人际传播视角解读》,载于《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④ 陶建杰:《大众传媒对民工观念的影响力研究》,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体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1期。

⑥ 陈韵博:《新一代农民工使用 QQ 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载于《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8期。

⑦ Ke Y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mongst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Technology & Policy*, 2008, Vol. 21.

⑧ 丁未、宋辰:《在路上: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载于《现代传播》2010年第9期。